

试论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 前后蒋介石之心路

冯 琳

内容提要 国民党撤退台湾之际,为取悦美国,蒋介石重用吴国桢、孙立人,但对其缺乏充分信任。1953—1955年,美台关系在形式上更为稳固,而蒋美之间的某些矛盾在暗中发酵。在台湾政治经济基础初定之下,蒋对美援患得患失心态渐有改变,亦不愿对吴、孙继续容忍下去。吴与孙的失势意味着威权体制的强化,同时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对美国底线的试探。台美并非单方面的需要关系,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在这场博弈中,尽管蒋最终成为胜者,但两案毕竟关涉重大,此间,蒋曾经历艰难心路。

关键词 蒋介石 吴国桢 孙立人 台湾 美国

关于吴国桢事件与孙立人事件,论者不少。如《台湾三十年》(茅家琦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两事件是新形势下国民党内权力再分配的结果,蒋介石在克服危机后,要过河拆桥,专意扶植蒋经国;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者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不满的反映。大陆学界一般认同这一观点。曾任孙立人随从秘书的沈克勤在台湾出版了《孙立人传》(学生书局1998年版),对孙案有相应记述,并将孙案相关文件及其他有关孙立人的资料送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台北中研院朱浚源曾对孙案深入论证并进行访谈,发表过不少成果,他认为孙立人并未谋叛,其部属郭廷亮亦非“匪谍”。^①对于两事件过程,学界有过许多描述,特别是关于孙案,已有论著呈现纷繁迷离之态,但对蒋介石处理两案过程中的具体考量尚无研究。

一、吴案与孙案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欲弃蒋保台,看好孙立人、吴国桢。吴与孙原本也

^① 朱浚源有关论著如:《官方档案与历史真相——孙立人叛乱档研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四届讨论会——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台北,“国史馆”1998年版;《孙立人与高雄“郭廷亮匪谍案”真相》(与沈克勤合著),黄俊杰编《高雄历史与文化论集》第4辑,高雄,财团法人陈中和翁慈善基金会1997年版;《再论孙立人与郭廷亮“匪谍”案》,《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之法律与历史探讨》,台北,财团法人补偿基金会2001年编印。

曾为蒋看重^①,为获美国支持与援助,蒋介石投其所好,将二人委以要位,任命孙为“台湾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随后升任“陆军总司令”,吴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仅数年后,吴案与孙案先后发生。

由于任职不愉快且受到无形胁迫,1953年3月,吴国桢提出病辞。蒋介石面慰,准养病一月后再定。^②4月,蒋批准辞呈。5月24日,吴携妻赴美^③,其父和幼子被迫滞台。1954年1月,报界盛传王世杰去职与吴有关,要求吴尽速返台。吴拒绝回台,并要求辟谣。因得不到答复,吴欲在台湾登报澄清,未能如愿,于是开始通过美国媒体向国民党发难。

1954年3月,台湾“行政院”呈文称:吴国桢“藉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诬,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并言,“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3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检讨“用人不当”,指示中央“彻底检讨,研究改进”。中常会认为吴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党与“政府”,触犯党章第七十一条第一、五两款。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同日,蒋发布“总统令”,称吴国桢“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④台湾当局要求美国引渡吴回台,遭拒绝。

1955年6月初,蒋准备在台南屏东阅兵。5月28日,蒋获情报说孙立人欲借阅兵发动兵变。^⑤6月6日,“总统府”卫队在阅兵前抵达校阅广场警戒,并检查现场。原定参加检阅部队被重新整编,阅兵时间被推迟,两栖作战演习亦被取消。当局称孙的老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预谋在屏东阅兵时配发实弹,发动“兵谏”,因预谋不慎而被告发。台湾保安机构逮捕了郭廷亮等一百多名官兵,孙随后被监管侦讯。

8月3日,台湾报刊登出孙立人的“辞职书”,说郭廷亮“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对“兵谏”问题,孙称:“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海导无方,竟至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演成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知人不明,几至贻误国家,百身莫赎。”孙立人自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⑥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密谋犯上”的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又指定陈诚、吴忠信、许世英、俞鸿钧、何应钦、黄少谷、俞大维、王云五、王宠惠等九人组成孙立人案调查委员会,进行审查。10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主犯是“共谍”郭廷亮,孙对“共谍”失察,客观上被敌利用。20日,“中央社”电台播放全文。同日,蒋介石出具手令,说孙立人“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

① 吴曾为蒋私人秘书,为蒋信任,几度出任重要省市长官。孙立人曾在抗战时立下赫赫战功,并为蒋介石在台湾训练军队,蒋对孙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对其才能有一定认可。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3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③ “K. C. Wu For U. 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5, 1953, p. 16.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〇、九三三会议纪录, Ruan Yicheng,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007C49—141.03/04.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5月28日。

⑥ 汪泗洪、戴健、钱铭:《孙立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蒋随即软禁孙立人,将其部属亲信调离军职或查办,受牵连者达336人。^①

二、案前种种之因

20世纪50年代,吴案与孙案引起不小震动,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它们的发生并非突如其来。

(一) 福兮祸兮:吴、孙之美国背景

吴案与孙案之所以备受关注,不只是因为二人为台湾当局高官。他们的美国背景亦使两事件具有别样的意味。

孙立人与吴国桢是当时美国寄予期望的两个人。1949年11月,美方建议:吴国桢接任台湾省主席,孙立人统率台湾军事,蒋介石清除累赘的政府组织,并除去旧式军人与政客干扰。^②在某种程度上,“托美国之福”,吴国桢成为退台后第一任“台湾省主席”,孙立人成为“陆军总司令”。

194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曾有附条件提供美援之议。在此前后,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之说,还曾多次研究直接出兵占领台湾的可行性。但以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为首的国务院认为,此举“政治上代价太大,不值得”。^③在中国大变动的时代,应以观望态度“等待尘埃落定”,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以确保行动自由。这样,尽管12月吴国桢被委以要职,因美国国防部与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援台计划为国务院反对,美援并未到来。

1950年初,美国官方态度欲将台湾排除在远东防御体系之外^④,但蒋介石在感到压力的同时,深信美国不会真正放手,自记:“艾其逊之政策在最近期内如不改变,则其政治必失败无疑。”^⑤不久,美国的摇摆政策在朝鲜战争的炮火中宣告终结。蒋与杜鲁门仍需继续打交道,但二人之间存有芥蒂。在杜鲁门任上,蒋始终小心提防美国对台疏远。^⑥对于美国欣赏的吴与孙,蒋只得继续施以包容。

1952年11月共和党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蒋介石顿有扬眉吐气之感。虽然此后在具体问题上蒋对共和党也有不满之处,但至少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之初,蒋心情大悦,认为共和政策坚定^⑦,将会积极支持台湾。在此心境之下,长期以来蒋碍于美国而压抑着的对吴、孙的不满情绪也开始释放。

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任命蓝钦(Karl L. Rankin)为首位驻台“大使”,4月,蓝钦呈递“国书”。

① 刘育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审判结果之研究——就已知二百二十个案件的分析》,南投,《台湾文献》第56卷第2期,2005年6月,第344页。

② 吴昆财:《1949年的台湾: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为论述主轴》,台湾,《中华人文社会科学报》第2期,2005年3月,第33页。

③ 资中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④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January 5, 1950,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p. 11.

⑤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9卷,1950年1月5日,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版,第10页。

⑥ “杜鲁门并无一定之主张,难免他日不为彼艾(艾奇逊)所动摇,故危险仍在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6月反省录。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2年11月8日。蒋在1953年1月31日上星期反省录中称:“月杪杜勒斯所发表之外交宣言,直称俄国为美国之敌人,毫不顾忌,更可知美国共和党新政府之政策积极而坚决,不能再有退缩之余地。”

蒋松了口气,感叹“四年之奋斗与忍辱”终有结果,认为“从此国际地位亦将逐渐恢复”。亦在同日,他决心撤换吴国桢,改组“省政府”。^①其日记中透露这样的讯息:蒋撤换吴国桢与改组“政府”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此前碍于美国态度尚未明确而不得不忍耐,美国的“尘埃落定”让他终于可以不必容忍。

美国对吴的支持,其实早就引起蒋之不满。1950年,因为蒋提出的“财政部长”人选不能与“省政府”合作,吴要求自兼部长。美使馆亦间接表示支持吴。蒋介石认为吴多半受美国在台使馆人员的影响。蒋告诉吴,名单已定,且已提常会,不能改动。最终虽仍依蒋意通过原定名单,但蒋介石“心滋不快”。到1954年4月,令蒋更加恼怒的是,蓝钦刚走马上任,就关注到吴国桢之事,曾与王世杰、叶公超就此事进行沟通,认为应妥善处理,以免“美友之不良推测”。4月7日,蒋在日记中流露出对此之不满,决定展期约见蓝钦,免其“干预人事之嫌”。8日,报界传出蒋介石接受吴国桢辞呈,拟以俞鸿钧代之。9日,蓝钦与陈诚交谈,其意与王、叶所谈相同,望与吴国桢留一余地,以免美对其友好者误解。虽蓝钦说不以大使地位说话,陈诚等人也说他出于善意,但蒋仍认为其“启干预人事之端”,决定批准吴国桢辞呈,以免夜长梦多。^②美国人的出面求情,反加速蒋下定决心。

关于吴案的研究,一般认为吴国桢去美之初,碍于儿子滞留台湾成为人质,并未有任何对台湾不利的言论。^③依照这样的说法,似有一疑点,既然吴已去美,且并未有对台湾不利的评价,那么1953年11月,因何传出吴国桢涉嫌非法套取巨额外汇的流言?1954年1月受国民党资助的《民气日报》又因何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社论?蒋介石为何对已去职而对自己并无异议的下属还要穷追不舍?其实,1954年2月之前,吴虽未借媒体大张旗鼓攻击台湾政治,但在其与美国友人的接触中,“台湾不民主”的看法早有流露,在蒋看来,吴国桢对台湾当局的不认同在美国人士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1953年11月6日,蒋介石宴请美参议员史密斯(Ian Douglas Smith),席间史密斯谈到对台湾政治的意见,以为台湾当局不民主。蒋以为“彼受吴国桢影响已深”,感叹“美国之士之先入为主,认吴为天下之第一等人才,而不知其欺骗美国人多少事也”。^④随后王世杰案发生。王跟随蒋多年,屡任要职,时任“总统府秘书长”,11月间突遭免职,并未言具体原因。学界认为王世杰被免职与吴国桢有关,并认为系蒋介石打击政学系之举。^⑤王案在当时引起诸多猜测,以致国民党中央特意强调:“本案是单纯整饬纪纲调免人事而已,并无其他政治因素在内,希党内同志不要迷惑于外电的误传和社会的谣言。”至于他免职的原因,能不能公布,或在怎样的时机才能公布,须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⑥蒋在日记中,既未写明王世杰案与吴国桢的关联,亦未详细写出对王世杰做如此严重处理的理由,开始时仅称自己对王的“不尽职守蒙混舞弊”如何痛愤,后来,曾偶然提到,“此次免职为余政策上有冲突,彼乃反对余反美之政策也”。^⑦确实,从“反美”之意看,两者是有关联的。处理吴是“反美”,处理王也是“反美”。蒋对下属“痛愤”之意的表达是常有之事,但不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4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3月11日,1953年4月7日、9日。另参“K. C. Wu Resig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 9, 1953, p. 1.

③ 如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11月7日。

⑤ 如何明主编《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页。另外,黄嘉树认为政学系对国民党退台后的各类改造不满,因而遭到排斥。在吴国桢事件前后,政学系其他主要成员如王世杰等也遭免职等处分,政学系虽仍有张群等个别元老未倒,但离决策中心却越来越远,长期活跃于国民党政坛的政学系“无形无感”地消失了。(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05—218页)

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第六七次会议纪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Zhong Guo Guo Min Dang, 7. 4, Reel 5。下同。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11月17日、21日上星期反省录。

是每次都会给予免职处分,何况是追随自己多年的心腹之人。蒋介石离不开美国支持,但蒋与美之间在为共同利益所绑定的同时,也暗中进行着博弈。即便在美台最亲密的时期,蒋也会在日记中时而流露对美国某些做法的不满。1953年刚上台的美国共和党对台政策更为坚定,此时却也是蒋介石开始释放“反美”情绪的时候。虽然蒋对美的不满更多来自于阻止其反攻之类的“大事”,但不可否认,吴国桢在美友面前对台湾民主的微词也是触发蒋抵触情绪的具体原因。

据陈诚回忆,王世杰去职后,吴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他苛取巨额外汇,并与王去职有关。为证其清白,吴函请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转呈蒋介石彻查,复又迫不及待地要在台北各报刊登澄清之启事,因未得及时登载,而开始大发“叛国谬论”。^①

同吴国桢情形类似,孙立人与美国的亲密关系也令蒋介石感觉如芒刺在背。而美国反对军中政工、希望蒋撤销政治部、让孙掌握全部军权,则是蒋孙矛盾的最大关节。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撤销政工,但几年后又把将领变节、士兵离心和大失败归为取消政工所致。退台后,蒋介石在台湾军中重建政治部,并让蒋经国负责此事。孙立人在此问题上不是很配合,且曾将不满流露于美友之前。蒋介石既要抵制美国的干涉,推行带有秘密色彩的政治工作,又很忌讳孙“泄露机密”与“告洋状”。1950年6月26日,蒋自记:“严戒孙立人阳奉阴违及招奸泄机各种不法行动,如其不改则不用他之意,明告之,姑视其果否悔改耳。”1951年初,蒋又在日记中称,孙“几无东方军人之品格”,“不惟希冀挟外自重,而且密告内部之事,原定心迹乃为讨好外国而其影响则无异诋毁政府诬陷上官,其害所至将致卖国亡身而有余”。表示要防制“孙(立人)毛(邦初)等勾结外力要胁上官”。^②蒋似乎在脑中形成孙立人爱“告洋状”的惯性思维,一旦有军中机密泄露于美方,他很容易认为是孙所为。^③在蒋心目中,孙立人甚至成为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美国顾问来后,蒋准备再次告诫孙“毋依赖,毋骄矜,勿作挟外自重”,并通告各主官“不作越分亲外自贱以能交接外人自豪,应要自力更生”。^④

美国不认同在军中建立政治部之“苏派”做法,且在与台湾当局的交往中,不时有这样的意向表达:希望撤销政治部,将军权交孙立人。对于此点,蒋很警惕,结果,美国非但未能帮孙拿到统率军队之权,反增添了蒋介石的戒心。1951年1月,孙立人表示辞职之意。25日,蒋认为孙“行态似有愤愤不平之心”,想以辞职相胁,其意是要获得国民党全部军队的指挥权,感叹孙“太不自量”,“仅藉美国之感情保护而不知其本人之才德如何”。29日,蒋打算向孙表明他的才品声望皆不能作“反攻总司令”。9月,台湾六十七师整编完成,开始美式训练。随着美国军事顾问团对台湾军队事务的更深介入,美对台的控制“日紧一日”。蒋对美做出让步,允许其参与军事预算,而美并不知足,仍提出撤销政治部、军权全交孙立人的要求。蒋介石很是气愤,表示别的都可协商,唯独撤销政工与孙统掌军权这一关涉“存亡”之事不能商量。^⑤

孙立人与美人交好,交友范围不局限于军方,这一点亦让蒋感到恼怒。1953年7月,蒋听说孙立人宴请外国教授与不相干之军人,斥孙“荒荡狂妄”,“非严教切戒不可”,并为此“心绪又不能安定”。^⑥

艾森豪威尔就任后,表现出对台湾更多的亲近。1954年他在新年国情咨文远东部分中,除韩

① 陈诚:《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6月26日,1951年1月29日、2月3日、3月9日、3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如1953年1月18日蒋介石日记:“据(周)至柔报称,蔡斯面质其石牌高级班由日本教官秘密训练,认为对其日员不再作训练工作之诺言背信,并言我国陆军方面亦甚表不满云。此当为立人方面对美军顾问供给消息,其藉外自重乃如此乎。”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1年4月29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1年1月21日、25日、29日、9月30日上月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7月8日。

越二战区以外,独提“中华民国”之军事、经济援助,蒋对美援信心倍增,以为美国之民意与舆论有利于对台援助。在此情况下,虽然蒋介石为防孙的恼羞成怒而对其“傲慢无视”耐而不较,仍“期其自反自改”,但耐心是越来越少了。他决定在警告孙的同时,亦警告美顾问“勿鼓励中国军官违法玩命者……须知其不忠于本国者必不能忠于友邦者,结果徒为其自累而已。”^①

此时,蒋介石对孙立人的任用问题做出判断,认为若如美国所愿,任用孙为参谋总长,则美方会心情愉快,但美援决不会因此增加;孙本来就“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则其气势更盛,对内影响恶劣,且会弄权自用,派系更大,“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样,不但“复国”前途无望,而且“政府重心亦将动摇”。若将其架空,用为参军长,使其“无权可弄,无势可恃”,则可敷衍美国,惩戒孙本人,让其明白“决不能恃外势以维持其地位”。蒋决定调孙任有名无权之职位,“使之彻悟以转移其心理,一面再令其在左右学习训练,或可有成全之望”。蒋以为“与其养痍遗患,将有不可收拾之一日,则不如毅然断臂,早为自立之计”。即使美援受此影响,亦不能顾及。“与其受外援而动摇国本,则此外援无非饮鸩止渴,何足为虑”。况且,以目前美国内外情势,“决不以孙之关系而减少其援华之方针”。因此,1954年6月,蒋不顾美方意见,任用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在美援大局稳定后,蒋决定在“陆军孙立人军阀形成之初期,乃决操刀一割,以绝后患”。^②

为获美援,蒋介石重用亲美派,表面实行民主,但骨子里,蒋并不十分认同民主自由。^③在美国对台政策尘埃落定,美援纷至沓来,“大使级外交”亦开始实施的过程中,蒋介石逐渐失去对吴国桢、孙立人的忍耐力。加重吴、孙身价的砝码——美国背景,亦日渐变为促使其被排斥的负累。1954年前后,蒋介石逐渐做出判断,美援大局已定,美国不会因为一两个官员的用与舍而增加或中止对台湾的援助,不必再对吴与孙继续容忍。

(二) 人际与个人

20世纪50年代,台湾实行的是“法治”形式下的威权专制。在这样的社会,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是个微妙而重要的问题。吴与孙处理这方面问题都不老练,他们在官场,尤其是在蒋身边不能如鱼得水。

吴国桢与“太子”蒋经国的矛盾由来已久。不但有吴任上海市长时的“打虎”风波,还有1950年逮捕王哲甫事件等,这些在先行研究中已有较多介绍。^④退台后的几年中,吴国桢因不赞同蒋经国、彭孟緝在执行情治与保安工作时的做法,多次提出抗议或辞职意向。

吴与“行政院长”陈诚的矛盾也很深。吴国桢称,在总理纪念周,陈诚指责吴国桢用欺诈手段获得“省主席”职位,即在美国掀起个人宣传,以自己能带来美援欺骗“政府”。这令吴国桢怒不可遏,从此不论制订什么计划都不同陈诚商量。^⑤而据陈诚所述,当时对于吴,自己是仁至义尽。吴接任省主席时,曾引起社会上种种疑虑,大有“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之势。“参议会”为厅长与省委人选,竟曾罢会。陈诚从中调解,但不知为何反引起吴的误会。^⑥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院”改组。阎锡山去意已决,蒋选中了对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1月9日、9日上星期反省录、11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6月31日杂录,1954年7月3日。

③ 蒋介石曾有这样一段话:“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战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要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52年12月13日。

④ 如孙宅巍《对台湾吴国桢事件的思考》,《学海》1994年第2期,第84—85页。

⑤ [美]裴斐(Nathaniel Peffer)、韦慕庭(C. Martin Wilbur)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⑥ 陈诚:《陈诚回忆录》,第73—74页。

自己忠诚又任劳任怨的陈诚。拟任用陈诚出任“行政院长”时，吴国桢坚求辞职。蒋素知陈吴二人矛盾，认为是“意中事”，但当时美国对台仍只是尽量隔离的态度，台湾混乱动荡，蒋需要吴争取美援，亦需要陈披荆斩棘，这时惟有尽力使二人合作。因此蒋“慰”吴，设法使之安心，并邀吴国桢夫妇聚餐，“劝告其强勉忍耐，与合作”。^① 陈诚也认为“国家到了今日的地步”，惟有“不惜任何代价”使吴留任并兼任“政务委员”。于是吴陈勉强共事，但终未能相处愉快。据陈诚回忆，吴国桢主台，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而自己恐被指为小气，对他尤为容忍，不料却助长了吴的骄横之气。^② 有研究者指出，吴国桢在实力、权位、资望等方面都逊于陈诚，虽然在外有美国人撑腰，在内却相对弱势，但吴却做得非常强势和张扬，蒋吴决裂是迟早的事。^③

在人际关系方面，孙立人也不圆通。

政工问题是孙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的一个症结。1950年5月1日，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推行政治工作。军队中设政治军官原是师俄的产物，1945年，军队国家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乃取消军队党部。大陆失败之时，国民党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放弃。“复职”后的次月，在蒋介石支持下，“国防部”4月1日公布《国军政治工作纲领》，恢复军中政工。^④ 但政治部人员在军队落脚之初，就遭到孙的拒绝。蒋氏父子为此事曾有讨论。^⑤

另一个节点是“匪谍”问题。蒋经国主掌情治，抓捕“匪谍”，曾被孙立人干涉。1950年3月22日，蒋经国告诉蒋介石，说孙包庇“共匪女谍”王氏姊妹，不肯遵令解缴。蒋介石闻之，“心怀不平，颇愤激”。4月17日，蒋认为王氏姊妹实有重大嫌疑，而她们与孙关系深切，“可骇”。6、7月间，情治部门又在孙部发现“匪谍重案”，认为李鸿、彭克立等人受共产党指使来包围孙立人，以便响应攻台，蒋感叹孙“野〔夜〕郎自大粗浅糊涂，不知如何结果矣”。1954年蒋介石决定架空孙立人时，曾对其有一综合评价，认为“其性拖拉呆滞，好听细言，私植派系，用人复杂，心无主旨，受人愚弄，间接已受共产包围，环境险恶，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其掌握兵权，则后患难除”。^⑥

孙立人与“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有矛盾。1953年11月底，在“国防部”军务会报中二人冲突。事后，孙被蒋介石训诫，理由为“恃外凌上”，说这是“最卑劣之人格”，并举二事为证，证明孙之“目中无人”，令孙向周至柔认错解释。^⑦ 孙之行为似乎时常被蒋与“恃外”二字相关联，不管孙是否真是出于“有恃无恐”的动机。

由于人际关系不佳，“美国人撑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吴与孙在国民党集团的“立身之本”，而这个“立身之本”其实并不牢靠。

在蒋看来，傲慢、固执是吴与孙的共同点。有美国支持本不是坏事——若他们能表现出对“领袖”的顺服和忠心。台湾需要美国，而吴与孙其实也都有其过人之处。^⑧ 因此，蒋介石其实给过吴与孙“反省改过”的机会，但他们并未变成蒋所希望的样子。

据吴称，蒋介石曾欲使吴国桢与蒋经国修好，让黄伯度带话给吴的岳父，若吴愿与蒋经国合作，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2月27日、3月6日。

② 陈诚：《陈诚回忆录》，第74、269页。

③ 左双文：《退台初期国民党高层人事纠纷几桩个案的再解读——侧重从陈诚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52页。

④ 唐振楚编：《总裁办公室工作纪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非常委员会及总裁办公室资料汇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288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5月12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3月22日、4月17日、7月7日、7月28日，1954年6月31日杂录。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12月2日。

⑧ 陈诚对吴国桢虽有成见，亦承认吴“并非庸才”，在“行政院”会议中，其意见常受到重视。见陈诚《陈诚回忆录》，第276页。

便能取代陈诚执掌“行政院”，同时兼管“省政府”。蒋介石并以1万美金资助吴国桢大儿子赴美留学。但吴并未因此改变态度，依然将蒋经国手下非法抓到的人释放。^①

组阁之时，吴国桢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部长”人选，在蒋表示无法变更时，他仍坚持己见，令蒋十分不悦。1953、1954年，情况更甚。1953年蒋介石认为吴国桢骄矜，“无革命与领袖之信心在其脑中”。4月，蒋准备更换吴时，吴未有妥协服软之意。11日，蒋介石决定批准吴国桢辞职，理由是吴国桢藉美声援，有恃无恐，骄矜孤僻，“对余亦不在心目”。可见，吴对蒋的态度是蒋决计撤换吴的重要原因。蒋希望下属对自己诚服，而吴没有做到。加上蓝钦对处理吴国桢之事的干涉，蒋认定吴是依恃美国、自抬身价。蒋希望他能悔悟，若能“痛改前非”，“则其才仍可用也”。直到1954年2月，蒋介石还有疏导、劝慰之言，自记“国桢言行渐近于威胁与越轨，态度仍应导之以理，使之觉悟复常，由晓峰（张其昀）代为劝慰之”。^②

蒋介石对于自由主义并非完全缺乏容忍。出于政治家的精明与迎合舆论的需要，蒋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了“领袖的大度”，譬如对胡适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对比鲜明。有文章曾分析“强者”与“智者”如何怀揣不满携手共进的微妙关系。^③如果说蒋掩饰内心真实想法对胡适施以克制与忍让，体现了他对学者的某种包容，那么似乎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蒋介石的“心胸狭窄，不能见谅于吴国桢，使吴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下的牺牲品”。^④吴国桢本人不能做到胡适的“圆通”，也是造成蒋“小器”的原因之一。

同样，孙立人的失势也与性格有关。蓝钦对他的评价是忠诚，但有些“欠谨慎与幼稚”。顾维钧也有一致看法。关于孙案，顾维钧认为孙并非出于“不忠”，而多半是不小心或“可能有几分不自觉的放纵”。顾曾与孙谈话，劝他说话时应稍加谨慎和注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重视他的观点和态度。但孙没有改变，仍保持坦率。^⑤

退台后，孙立人不太注意掩饰异见。在军训班讲课时他公开主张“军队国家化”，这与蒋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孙公开指出上级遥控是军事失败的关键，听者自然想到是指蒋越级指挥。^⑥在威权时代，孙立人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高官。而这些真言无疑是逆耳的。

孙立人西方式的率直与敢言，成就了他在美国友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却开罪了蒋氏亲信。有研究者指出，蒋氏父子通过制造“郭廷亮匪谍案”、“屏东兵变案”，消除异己，同时也平息了自己的亲信长期对孙的不满情绪。^⑦

三、蒋介石在两案期间的心态与应对

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对吴国桢与孙立人两案的想法，有时自己需要陈列理由，反复考量，足见两案关涉重大。

（一）应对吴国桢案

1953年3月，吴国桢提出病辞，蒋虽也有慰留，但随后便在日记中发泄情绪，写道：“吴国桢之

① 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第154—158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3月11日，1953年4月11日，1954年2月6日。早在1950年2月15日，蒋介石便记曰，吴国桢“对余信所言虽勉强顺从，但并非诚悦，人才最重要者为顺理识体而不倚外自重也”。

③ 参见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李松林：《晚年蒋介石》，第168页。

⑤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4—575页。

⑥ 陈存恭访问，万丽鹃等纪录：《孙立人案相关人物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版，第42页。

⑦ 汪泗洪、戴健、钱铭：《孙立人传》，第274页。

不能诚矣,其玩弄手段至此,殊所不料。余以精诚待彼,而彼反以虚伪手段对余。”蒋认为吴骄矜虚诈,只图个人利益,无视领袖^①,明确表达了对吴的绝望之意。

4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美国新大使呈递“国书”与决心撤换吴国桢、改组省政府之事。5日,蒋开始追究吴此前抛售粮食之过。^② 抛售粮食事无疑为“省主席”吴国桢所首肯,在决心撤换吴的次日,蒋将此事所致恶果上升到与1947年宋子文私自动用改革币制基金致使法币崩溃一事等同的程度,并在16日的中常会指出,吴应对粮政失败负其责任。4月中旬新旧“省主席”交接,并未影响美国对台态度,蒋介石对此很满意,以为这一情况“或国桢所不料及也”。事实上,美国对台援助非但未因吴国桢卸任而减少,反而还有增加。3个月后,美国两院对台军援经费增加20%,并另拨总计排水量达5万吨之舰艇,“此属难能可贵特殊之举动”。^③

1953年11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NSC146/2号文件,指出保证台湾安全并免于被共产主义渗透是美国远东防御的基本要素,建议继续向台湾提供援助。^④ 据11月2日蒋介石日记,在此前后,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而一些原本反蒋的美国报纸也忽然登载对蒋推崇之文章。这些无疑确定了蒋的判断:去除身边亲美要员,不足以影响美国对台政策。

面对吴在美舆论攻势,蒋认为“吴国桢公开反动必欲损毁政府之险恶言行已经暴露”,应“设法防止”,指出吴“辞职诟病之真因”是其在任期间因抛空公粮,无法维持军民之食等因,并不是因为“政府”不民主而辞。^⑤

此时,“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在召开,吴国桢于1954年2月27日致大会函,痛陈台湾之弊:一党专政,军队之内有党组织与政治部,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并提出六点措施。^⑥ 在蒋介石看来,吴以蒋氏父子为指责对象,视蒋为操纵“国大”之独裁集权者。“国民大会”主席团决定对该函“一面严词痛斥,一面不予受理”。^⑦

3月初,蒋介石认为若不从速惩治吴国桢,将来第二第三之吴国桢必相继续出。应立即以违法乱纪罪撤职查办或准予辞职,至于任职期内之所有渎职事实,应交付行政人员惩戒委员会依法处理,包括上海任内及交卸情况、操纵贸易有否混水摸鱼等,一并彻查。^⑧

为更有力地还击,蒋介石一面令“保密局”调查吴国桢抛售黄金弊案,一面令“立法院”从民间搜罗吴国桢贪污渎职证据。吴以前任职所有疑点处被置于放大镜之下,不但“保密局”、“立法院”等政府机构进行对吴的调查,党部内也进行着对吴的社会调查。^⑨ 3月17日,蒋发布“总统令”,要对吴在省政府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依法彻查究办”。实际上,在此之前,对吴的调查已经开始,且被调查的不只是吴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事。任显群曾为吴国桢任内的“财政厅厅长”。吴国桢赴美后,任显群也卸下公职。但因吴国桢事件牵连,遭情治单位跟监。“保密局局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3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11日。

② 吴国桢卸任前,批准抛售台湾存粮五万吨,造成粮荒。蒋介石认为“今日之存粮无异大陆法币之基金”,没有事先请示,是为大错。《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4月5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4月16日、4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8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 “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 6, 1953, Glennon, John P.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hereafter)*,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 14, Part 1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p. 307—310.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2月19日。

⑥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台北,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1995年版,第551—553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3月8日、11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3月2日。

⑨ 《党员社会调查报告对吴国桢案综合反映》,1954年3月,Zhong Guo Guo Min Dang, 7.4 reel 5.

长”毛人凤与任显群谈话,任表示愿“制造”(蒋介石日记所用之词)吴国桢贪污案,将功赎罪。3月11日,毛人凤汇报谈话结果,蒋认为不可,令三日内,任显群与外汇部门将抛售黄金有关情事,从实呈报。同时,“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将台民对吴贪污证据交蒋介石呈阅。13日,蒋介石召见吴任上海市市长时的警察局长俞叔平,查问吴在沪谎报卅万户口口配米之事。蒋断定果有其事。15日,蒋介石分别约见李寿雍、周宏涛、彭孟缉、毛人凤等,询问是否有重要证据发现,结果令蒋失望。17日,中常会通过开除吴国桢党籍案,蒋介石“以用人不当,知人不明,深自引咎”。^①

在发布查办吴国桢的“总统令”之后,蒋介石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与“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彭孟缉,指示应将吴案作为重中之重,以此工作为“第一之第一”。宋美龄的外甥孔令杰当时在美国协助蒋家搞外交,他认为对吴国桢应忍耐,以免影响对美外交。他劝蒋不必太依赖吴的罪证,“外人对政府处治失意政客总认为政府依势欺人,虽其有贪污不法之确证,亦多不注意也”。而同时,蒋对吴罪证的掌握也并不充分,虽经多方努力,吴在任时违法渎职之事,人证虽有,而物证甚少。^②

吴国桢在美国的言论引起多方关注,美国舆论对吴多持同情。原本对台湾当局言论亲善的《霍华德京报》以吴之谈话为据,刊出《警告蒋总统》一文。由于吴国桢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此次以“前台湾省主席”身份揭发蒋氏专制作为,抨击台湾不民主,其反宣传影响颇大,蒋介石甚为惶恐,认为这是1944年以来共产党反宣传后“最猛烈之一次”,“如美政府对我政策不能坚定,则必重蹈过去失败之覆辙”。^③在台湾依赖美国援助谋求稳定发展与军事安全的情势下,吴国桢所为令蒋不安。

吴案发生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态度比较温和,并未附和与指责。而周以德(Walter Judd)等历来支持国民党的亲华派仍然站在台湾当局一边。这令蒋介石在担忧愤懑之余感到些许欣慰。^④

1954年4月5日,蒋考虑了两条方案:“犯而不校、示以宽大”;“依法起诉”吴之“违法渎职”罪状,使其宣传无效。6日,经进一步考虑,蒋更倾向于“暂置不理”。因吴之宣传已“渐失效用”,若此时起诉,反重新引起注意。而美国会尚未通过本年对台援助预算,此时行动恐影响国会决议;若待7月之后再行起诉,美友会有更多谅解。^⑤

而这时,吴已连续发表多封致蒋信函^⑥,蒋以为其“更陷于蜗角穷境”,“不如任其狂吠使美国迷信叛逆者自动悔悟”。9日,在召见谢冠生、林彬、黄少谷之后,蒋了解到吴案准备仍未充分,有力证据不足,决定暂不起诉。^⑦

看到美国政府并未受到舆论过多影响而改变对台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喧嚣舆论亦渐趋平静,而吴开始表现出对自己不利的偏执,蒋决定对吴暂置不理,以免弄巧成拙。虽然搜集到的关于吴国桢违法渎职情事可作为反击手段,减弱其宣传效应,但要待美援问题在美国会决定之后,观其变而再作回应。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3月11日、13日、15日、1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3月19日、2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2月18日、3月2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3月31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4月5日、6日。

⑥ 4月3日,吴国桢再上“总统”书,希望蒋经国离台赴美,在大陆未“恢复”前,不必返台,以表明蒋介石无传子之心。见《陈诚回忆录》,第275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4月7日、9日。

(二) 应对孙立人案

相较于对吴国桢高调舆论战而言,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处理似乎比较宽容和低调,用心颇为辛苦。

孙为军事将领,蒋对他虽早有不满,但不得不施以一定怀柔。1954年初,蒋介石自记:“孙立人之傲慢无视态度于今为烈,因防其恼羞成怒,不顾一切之行动可虑,当慰勉之。”蒋认为孙与美国顾问过于亲密,他们对蒋经国在军中活动的抵制令蒋认为孙对其不忠。孙立人不但握有军权,还关涉美援问题,蒋不得不投鼠忌器。直到6月,蒋介石对孙立人及各主要人事之方针甚费心力,决定“再不能重外轻内,危害国家前途,故宁无军援亦所不顾也”。^① 蒋决心架空孙立人,宁可以损失军援为代价,孙立人被调任无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

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字。美国将协防的范围划定在台澎地区,不准备协防金門、马祖,这与蒋意相悖。

1955年1、2月间,美国曾为使国民党撤防大陈,而许诺以协防金门为条件。但后来背弃前约,蒋介石曾与之力争,不得已妥协,撤退大陈。4月,当美国政府要派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与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生(Walter S. Robertson)到台湾时,蒋介石认为会要求撤退金马,于是决定直告,金马是“中国之灵魂”,台湾海峡是“中国一线之命脉”,美国不能强求台湾“出卖灵魂与命脉”。蒋为此与雷、劳的交涉令其痛苦不堪。^②

不可否认,对于不少美国人来说,蒋介石并不是理想的盟友。1955年5月,美国内部有人提议以吴国桢、孙立人或胡适取代蒋。蒋获知,美国务院令其情报人员密查孙立人在军队中势力如何,能否掌握陆军;吴国桢在除台湾人以外的中国人中有否拥护者。5月28日,孙立人欲借阅兵发动兵谏的情报被送至蒋手中,蒋自记:“今以此案之发生究竟有否关系,并无证据,但国际环境之险恶已至相当程度,能不戒惧乎?”6月3日,俞国华报告其在美国所悉美中央情报局准备大肆利用台湾与国内外中立派及反对派对蒋个人作诬蔑宣传,以为其重建傀儡政府之张本。蒋认为,此与最近孙立人军训班之阴谋显然有关,当然亦为劳氏以蒋不顺从其放弃金马建议之第一步行动。几天后,孔令杰又报告说,美当局或将因台湾不民主之指责,期以推翻蒋政权。接着,蒋获悉,美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致电蓝钦,欲保荐孙为参谋总长。^③ 可以推断,孙案与此间种种传闻不无关系。蒋获得美国方面对自己的不利消息,认为孙立人军训班与美国欲在台湾改朝换代的想法有关,对自己造成了威胁。6月6日对阅兵现场的搜查、“兵谏”风声的放出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行动,皆与蒋在此时的戒备惊恐心理有关。

6月19日,蒋介石拟见蓝钦,询问华府所盛传的美对台政策改变之意,并提到孙部谋叛败露时,孙欲逃往美使馆,请求政治庇护之说。孙欲逃往美使馆的消息增加了蒋的不安。历代君王对于“叛逆者”皆具宁可信其有的倾向,何况此时华府又有种种颠覆自己的传闻。这种情况下,蒋对孙有了一份主观的判定,认为孙并不清白。同时,蒋认为,即便孙不是在美国的指使之下发动此事,至少是“受美国之暗示久矣”。^④

同时,蒋又认为孙被共产党“渗透”利用。6月28日,蒋审阅郭廷亮等人供词,断定这一事件背后有共产党因素。经一个月的调查,虽然所谓“共产党渗透”的证据并不充分,郭廷亮也未明确承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4年1月9日、11日,6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2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4月20日。4月30日上月反省录记道:“本周与劳勃生等谈话的斗争实自卅五年与“马下儿”(马歇尔)激战以来最大一次之决斗。”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5月30日上星期反省录,5月28日,6月3日、8日、10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6月19日、30日,5月30日上月反省录。

认与共产党的关系,但蒋仍认定“此为一老共党员潜伏在孙之左右无疑”。从李鸿、陈鸣人等“匪谍”口供中,蒋介石推断孙立人早已蓄意“通匪”,有心庇护“匪谍”。^①

关于对孙处置方式与尺度,蒋介石曾征询蒋经国、张群、俞大维等人意见。“国防部长”俞大维主张不加处分,仅以调职佯作信任。俞认为美国人不会相信台湾当局对孙案的说法,若此案公开,徒贻共产党与反对派以口实,使之以为国民党军队内部为政工与派系之争而动摇已呈不能控制之象。蒋介石认为俞“消极已极”,“此次叛变阴谋能事前扑灭而并未发生,乃是确能控制一切阴谋之表示,何损威之有耶”?但俞的看法“亦有其见地”,此案处置应重加考虑,“终以不暴露公布为宜”,在尚未反攻大陆以前,“无论对内对外对敌对友不能不极端慎重免乱大谋,尤不可授美国政府以口实耳”。这是蒋介石对待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不同之处。吴国桢在海外以言论攻击蒋氏专制,因而蒋须高调反驳;而孙立人本人没有对台湾当局和蒋氏父子进行舆论攻击,相反,为免“美国及其反蒋派引以为独裁之口实”,蒋介石需要对处理办法“慎重研究”,低调进行。^②

7月5日,蒋认为应明告孙此案之经过供词、内中反党政口号之制造、郭廷亮“匪谍”与郑子东父子之关系。准备“以不信孙会主谋此案之态度”,免于追究,但孙应告假反省悔过,不得再与“匪谍”来往。孙可言行自由,不予拘束,但“对此案无论对任何人必须照此实情明告,不得另有托词假言,否则自将公审”。9日,蒋又有这样的考虑:令孙告假离职,待罪悔过,但不开除其参军长原缺,派员代理;使其与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祝同对调,使其与叛将(白崇禧)并列;仍令其闭门思过,不得任意说话,“待其悔过自新以后另候任用”;江云锦自白书非至不得已时再令其参阅,暂不说破为宜,保留余地。15日,蒋再次写道,应让孙告假,专心读书修养。在此之前,蒋对孙的处置问题考虑得相对宽大,主要的惩戒措施是让其告假反省,但还保留有一定职位。但16日,蒋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应以公正事实为据,不能全以外人关系而置军心与纪律于不顾”,于法于理,对孙至少应停职候查或候审,或免职查办,“以息公愤,而维军纪”。原因是:

甲、此案为共匪早在国际上扬言台湾之渗透程度比所传者为更佳,是乃美政府在事前所获得之情报,乙、此案人证与确据皆有事实,不得已时皆可公开,丙、此案主动乃为共匪渗透颠覆而为我破获彻底,并未为共匪所算,孙不过是一被动盲从,故于政府之威信并无所损,丁、孙之美友以事实俱在,不能为其抱不平洗冤,或以此反对我政府,戊、此在美人心目中以有证据之事,而且为共匪所主动,不能认我为法西斯得(法西斯)也,己、现在美国不能放弃台湾,不能因此停止援助。

虽然“对于利害与美国心理亦不能完全抹煞”,但蒋介石分析后认为,美国现在不能放弃台湾,不能因此停止援助,而此事不致招致非议,且可平息孙之美友的反对之声。故决定施以惩戒,而不是佯装不信,仅使之告假反省。至此,蒋介石确定了“停职候查”的处置办法,但决定不公开案情。21日,蒋介石以为对孙应仍以宽大之方针处之,可明告孙本人对本案内容并非出于本意。但此案重大,若未提前制止,“则国家一线之命脉完全被其斩绝”,故应“自请处分,负责引咎,乃予以停职反省以观后效处之”,如其不服则即照原拟方案,以“停职听候彻查”处之。^③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6月28日、7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8月3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6月28日、30日上月反省录、7月3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7月5日、9日、15日、16日、16日上星期反省录、21日。

经几番思考,蒋虽碍于美国关系,始终以较为宽大的原则考虑对孙的处置办法,但也明确对孙应有惩戒措施,以安定内部,且这个宽大的尺度是有限的,并在几番考虑后又有紧缩和有限调整。当时,美国对中共苏俄有一定妥协之意,中美也在酝酿大使级会谈。6月间,蒋分析国际局势,认为在俄共和平攻势之下,美英必欲使蒋放弃金门以达彼等“苟安求和之期望”。“惟有在我者,才是可靠”。在处理孙案期间,蒋几度有“惟有在我”的类似表述。9月8日,蒋介石考虑“如何转移国人无外援不能反攻之心理”,认为应该特别宣传西班牙与土耳其之经历,使民众不过分依赖美援。11日,与“外交部长”叶公超谈话,劝诫其对美援不必过于奢望,“美国外交如儿戏冷暖无常,不足为奇,能否反攻,全在于自我也”。同时,“对联合国会员籍〔籍〕问题亦不必过于重视,当于其如侮辱过甚,则随时可以自动退出也,并可明示英美以此意”。虽然在共和党刚刚获得大选胜利和上台之初,蒋介石曾如释重负,以为几年来所受屈辱终于可以卸下,但随着形势发展,蒋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其内容与前无异,而且其培植第三势力与对朱毛为狄托之幻梦至今更烈矣”,随而产生“若不自强,何以复国”之念。^① 两案期间,蒋介石不但有对“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一判断更清楚的认识,也有“惟有在我”这一心理的日益明确,这是蒋敢于拿掉吴与孙的心理基础。

为使孙立人伏罪,国民党高官轮番上阵。在陈诚与之谈话未果之后,叶公超、张群相继明告其不可强辩、应自请处分之意。7月28日,蒋接到孙立人报告,请求辞职候查,以求保全,但并不承认自己“包藏匪谍,图谋不轨”。蒋认为他“既无丈夫气,亦无军人气”,“实为张学良之不如”。^②

由于孙不肯承认包庇“通共”之人,8月2日,蒋介石准备监视孙,并将其侍从陈良堦逮捕归案。3日,陈良堦亲笔写下自白书,证明王善从所供孙在去秋派其二人到蒋之草庐住所侦察地形、设计包围之企图是实。蒋决定将此原件交孙审阅后再定最后处置办法。在黄伯度与孙立人谈话后,孙承认郭廷亮及其军训班致成今日恶果之过,但仍不承认其主动谋乱之大罪。只是并不如过去之强辩,只求保全赦免。蒋认为至此可告一段落,即照原定方针以停职(候处)彻查为第一步。^③

5日,孙立人呈递自认罪嫌重大、请求保全与辞职候处、闭门思过之辞呈。美顾问因此事为台湾当局内政,表示不愿过问。蒋本人仍顾虑重重:

甲、吴逆国桢对孙案免职查办时必在美作激烈反宣传,英国亦必助其宣传以引起美国舆论对我不利之新潮,乙、孙之美友如麦唐纳及若干议员记者亦必怀疑对我攻讦,丙、政府亦必乘机大事宣传,丁、对内部不致有何影响,戊、今孙既自呈其悔罪书,对此事发表不妨从缓……己、应令孙自动宣布之办法,庚、此案应在八月内公布,不可在联合国大会时或在国会明年召集时发表也。^④

20日,“驻美大使”顾维钧与雷德福谈话,试探美方态度。雷说他十分敬重孙,丝毫不怀疑他的忠诚,建议台湾当局组织的调查委员会不要将调查局限于孙对于屏东事件可能的动机,而是调查该事件深层的原因以及对军队的影响。^⑤ 23日,美国驻台北“大使”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指出,孙立人一直以来被美国认可,如果在此事件上放弃孙,会被许多人视为对朋友不忠。孙始终与美合作,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6月12日,9月8日、11日,1953年4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7月26日、3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8月2日、4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8月6日。

⑤ “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ug. 27, 1955, Glennon, John P. (ed.),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3*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70.

为军援项目出力,在美国人看来,对他的指控几乎是难以置信的。^①虽然美国高官亨德森(Loy W. Henderson)表示美国在此事件上面不持官方立场^②,但不难看出,美国官员大多信任、尊敬孙立人,不相信台湾当局对他的指控。这也是蒋在孙案问题上颇费思量的一个原因。

吴国桢趁势进行反宣传和英国可能给予的奥援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美国舆论的不利倾向是蒋尤为担心之点。吴国桢隔海高调对抗是蒋无力回转的,而在孙案方面蒋的态度决定事态发展,因而蒋慎之又慎,“准备最为周到”。不仅谨慎考虑处理方法,且几次亲自修正孙案新闻稿,以求稳妥。^③

顾维钧、蒋廷黻等在美国从事外交的官员提议组织孙案调查委员会,8月15日,张群、黄少谷、叶公超等人于蒋介石交谈,认为不可。因无此先例,且破坏军法系统。而蒋以为“总统府参谋长”涉嫌此案,责任关系重大,可特别组织调查会,由王宠惠等法律权威参加,可减少国际误解,故准予设立调查会。^④

孙案调查委员会成立后,意见分歧,工作不得要领。蒋对其加以指示,要求报告简明迅速,不必过求深入,但应作精详之另一准备,以备不得已时公布其重要罪证之一部分。^⑤

孙立人免职令发布后,台湾当局通知所有新闻媒体暂不发表任何有关报道^⑥,并随即派人赴美国解释和寻求谅解。沈昌焕带着郭廷亮和孙的其他五名部下的供词,还有一组在宪兵队秘密受审时的供词,以及孙立人亲笔辞呈的复印件前往美国。孙在呈文中承认两点:他未能察觉郭的共党间谍活动;他未能有效监督部下的动向和活动。顾维钧、沈昌焕等人积极活动,尽最大努力将事件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⑦

经一番努力,免职令未引起美国舆论激烈反应,这让蒋介石放松了一些审慎思虑的神经。在调查会审问得不到满意结果时,蒋开始露出不耐烦情绪。9月18日,蒋认为孙不会承认自己对此案负有知情不报之责任,并将其归因于依恃美国而有恃无恐心理。这样的推断无形中激怒了蒋,为使孙有“悔悟”表示,决定指示调查会审问的方式与态度应有改正,不可再照原定以友谊关系为主的办法进行。当晚12时醒后,蒋为孙立人“狡愚无知之言行”“辗转苦思”,决定调查会传审时,只令宪兵正式护送。看各犯供词时,亦应改派军法局长正式监视,而不再派人以非正式之私人关系陪送,使其感觉情势严重。如其再不悔改认罪,即将转入军法途径,不留余地。又于深夜电张群照此进行。9月21日,蒋约见张群、陈诚与黄少谷,详询审问孙立人情形。得知孙虽未狡赖强辩,亦未否认六犯口供,但自辩其用心与作为皆出于忠贞而不承认有意叛变。调查委员会以为孙知情不报之罪已可成立,无须再加追问。但蒋以为其供词答非所问,不能澄清真相。如果发表,则大众必以为其真出于忠贞,会使舆论对其同情,而对自己不利。因此令调查继续进行,对孙每一答词应须有事实之证明。彻底澄清无疑会在宣传中掌握主动,“至处治宽严则另一问题”。但事实上,调查并不能做到每一答词都有事实证明。10月初,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书,蒋认为对孙主谋叛乱部分未能彻底查明,有避重就轻、为孙脱罪之意,但又认为此案惟有如此,无法继续深究。对于具体处置和

① “Notes of 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ug. 27, 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3, p. 69.

② “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ug. 27, 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3, p. 70.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8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17日、19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8月15日。调查委员会由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吴忠信等九人组成,陈诚任主任。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9月5日。

⑥ 《中央宣传指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纪录》, *Zhong Guo Guo Min Dang*, 7.3, Reel 7.

⑦ 《顾维钧回忆录》,第573页。

发布命令的办法,蒋介石又费了一番斟酌:如其处置太轻,一般将领未能心服;如依法惩治,则应免官判刑,国际舆论又会掀起轩然大波。思量之下,蒋决定转告孙应将其报效诚意详述无遗,彻底反省往日毁谤“政府”与“领袖”之言论,以及关于政工党务对美国顾问“自失体统之言行”,并检举平时对其策划鼓惑之可疑“匪谍”,以便减免其罪。^①

接着,孙案调查报告书与处理办法同时发表。蒋介石将此事设计为:孙立人因郭廷亮事件而自请查处,“总统”念在孙立人“久历戎行,于抗战有功,准予自新,不再追究,交由国防部察考,以观后效”。^② 此处理办法之重点在最后二语,目的是限制孙出国。蒋自认对孙立人已算“犯而不校”,中外舆论会认为宽大,无所异议;且其对此事已煞费苦心,再无其他办法。^③

学界一般认为由于孙立人屡立战功,曾帮助蒋渡过难关,蒋才对孙“犯而不校”,仅施以软禁。但笔者认为,蒋介石之“念旧”并不是对孙宽大的主要原因,蒋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并未提及孙的昔日战功。他所顾虑的主要是美国舆论及其可能影响到的美国对台政策,而非处理“有功之臣”可能引发的后果。而且,蒋介石亦认为“对孙个人之精神上处治比之较军法从事更为难堪”,此种处理办法,貌似宽大,实则并不宽大。

四、余论

吴国桢与孙立人在国民党退台之际,因美国看好而居要位。但他们的某些理念与当政者不同,反与美国一致。这令蒋介石不安,不但将许多事情冠以“恃外自重”之名,更猜疑美国对他们的“不忠”有所暗示。吴与孙有美国教育背景,其言行表现出与旁人的不同之处。但“骄矜”、“恃外”、“心目无领袖”、“不知悔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蒋的臆断。蒋似有一思维定式,对吴与孙的某些推测难免带有成见。即便他们有“悔悟”表现,也不被认可。^④ 从案前种种表现看,二人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并非偶然,亦不意外。

在具体表现和处理方式上,两案有所不同。对于远在海外、鞭长莫及的吴国桢,多是舆论战,因而重在对有利证据的建立,亦即吴违法乱纪罪证的搜集方面。蒋本欲指控吴国桢乃因违法渎职而辞职,以反击吴对蒋氏不民主的宣传,但因证据不足,且经过一段时间后舆论渐息,决定不起诉。对于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孙立人,蒋则显得更为谨慎,恐处置不当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美国的不利反应,因而反复考虑,在不断的思量中处理尺度和具体方式也几经调整。为求稳妥,在军法系统中特设调查会,并在削其职权后又为其开脱,以貌似宽大的方式施以软禁。

退台后,蒋介石要建立的是威权体制。日本学者若林正文认为,孙立人、吴国桢的失势,宣示了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逐步建立。^⑤ 其实此种威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的改造中即已出现^⑥,而吴与孙的去职意味着时机成熟之际威权的强化。1952年共和党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改变了杜鲁门时期对台湾保持“一臂之遥”的政策,拉近与台关系,有意以条约形式加固盟友关系;并改变对蒋的不信任态度,“放蒋出笼”。这就意味着吴、孙不再是争取美援的必要条件。即便没有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9月18日、19日、21日、24日上星期反省录,10月4日、7日、12日、20日。

② 《宣传通报》第144号,Zhong Guo Guo Min Dang,7.3,Reel 7.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10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 蒋曾记:“晚接国桢手书表示悔悟,但其本质乃为一个官僚与政客之模型,不能望其改为革命党徒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53年4月12日。

⑤ [日]若林正文著,洪金珠、许佩贤译:《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⑥ 参看冯琳《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第9章,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他们,共和党也会持续、甚而扩展美援。随着美国对台态度日益明朗,美援大局稳定,吴与孙的自由民主理念终不能为当政者继续包容。

1953—1955年,虽然台美关系更为巩固,但蒋与美之间某些矛盾在暗中激化,焦点之一即在共同防御的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美国不主张协防金马,而蒋介石决心坚守。此外,美国阻止蒋反攻大陆,虽解除台湾中立化禁令,实则限制更严;美国与中共开始官方会谈,并曾为朝战停火而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动摇表现……如此种种,使蒋介石对美不满之意频频流露。吴与孙两案,不但是蒋介石清除异己的行动,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对美国底线的试探。之所以敢于试探,乃因台湾政经已有一定基础,“不致如过去随时可任人宰割”。^①这是蒋敢于有限度忤逆美国意愿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拿掉美国最为看好的两位高官毕竟关涉重大,蒋介石在此期间每行一步都要小心观察媒体反应,仔细思量下一步如何进行才能尽可能减少舆论攻击,尽可能使自己看似更为有理。之所以步步为营,是要避免掀起舆论风波,进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自国民党败于中共,“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失去法理基础。蒋不但需要美国协防台湾,需要美援发展军事和经济,更需要美国帮助维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因此从打算免职开始,追究任职过失,搜集“罪证”,准备足够材料以备需要时公布,这些都是蒋介石有意关注的细节;而处置尺度和程序步骤如何方显妥当,也是令蒋煞费心思之事。蒋对吴、孙两人及两案记述之多,在其几十年日记中并不多见,足见蒋对此的重视程度。

[作者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谢维)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9月30日上月反省录。